

Column

■因学集

劳动管制模式何以会走向反面



◎周业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劳资关系非常重要,这一点毋庸置疑。从微观层面讲,和谐的劳资关系是企业组织有效率的保证;从宏观层面上讲,它是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以及社会秩序进化的基础之一。正因为如此,无论各国或者地区体制有何差别,无一不格外重视调节劳资关系。具体的制度五花八门,是否存在一些共同点呢?有!那就是利益平衡!也就是说,不管采取何种具体制度安排,其核心都是为了让劳资双方都不吃亏。这就要求任何一方的权利都不能过大。劳动法及其他相关的法律规则要确保的是劳资双方能够自由平等地谈判,而不是结果的均等化。

为什么劳动法及相关法律规则不能干预企业结果的分配?道理很

简单,每个企业的结果形成过程各不相同,影响因素各异,作为普遍原则,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可能预料劳资双方在这些具体过程中的实际贡献,或者说根本无法界定不同要素对企业结果的影响程度,当然也就无法准确判定分配方案的正义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硬性干预企业结果分配,必然影响劳资双方的激励,进而扭曲双方的行为,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

比如,假定某类工种的工人市场均衡月工资水平是800元,而法律要求企业必须支付900元,表面上看,是改进了这类工人的福利,但实际上可能给这类工人总体上产生福利损失。因为实际工资水平超过了市场均衡工资水平后,雇主要么



最低工资管制也好,劳动期限管制也好,管制者的初衷是希望以这些具体的管制政策来改进雇员福利,但管制者可能没有想到,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都会对管制措施采取激烈反应。管制得越具体,劳资双方的反应也就越快捷和越强烈,结果会使得原先的制度设计变得很糟。各国的实践表明,赋予雇员集体谈判的权利,结果要远远好于劳动管制。

降低雇佣量,要么延长在岗工人的工作时间,要么提高在岗工人的工作强度,要么干脆就把工厂搬迁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如此等等。结果,要么是雇主通过各种手段内部化了工资的上涨部分,工人实际到手的工资还是均衡工资水平;要么是这类工人的失业率上升,更多的人找不到工作。

工资管制如此,劳动合同期限管制也是如此。在合同期限管制的前提下,雇主必然会产生产激烈反应,去寻求各种规避措施。由于劳动合同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特别是无法预见一个企业未来的情形,所以一旦产生期限纠纷,法律总是无法有效保障雇员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管制方往往为了先前的一个制度上的错误,而用另一个错误来修补,结果整个制度架构就会由一连串错误的制度安排组成,看似完整,其实没有用。

当法律强制规定了一个合同期限的时候,比如现在的合同法规定的十年期限,雇主就会采取提前解约的方式来规避。实际上,如果法律规定八年或者十五年,企业同样在期限到来之前会做出反应。如前文所述,这样一个具体期限规定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一旦企业做出了激烈反应,管制方就不得不采取更严格

和更具体的管制来加以制约,比如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阻止企业的合同变更行为。

这样一个行政管制的结果会怎样呢?市场无疑获得了一个信号,那就是现在的管制方是偏向雇员的,或者说是讨好雇员的。那么好,雇员同样会在此预期下采取激烈反应。即使管制方一再邀请各种专家学者反复说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非终身特性,雇员同样以为可以借助管制方的力量把这种非终身性质转变为终身性质。比如,获得无固定期限合同的雇员即使不符合合同存续条件,也就是达到了雇主解雇的标准,由于劳动合同无法穷尽所有可能的因果关系,或者说界定这些关系的成本非常高,那么雇主就很难让仲裁机构或者法院确信雇员是否违背了有关标准。同样的道理,即使雇员没有违背有关合同存续条件,而雇主也可以找出违约的理由,此时雇员同样很难让仲裁机构或者法院确信雇主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形下,无固定期限合同是否存续,取决于仲裁机构或者法院的判定标准。而这一判定标准并不完全取决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

仲裁机构和法院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同样来自劳动合同的不完全。也就是说,法律所能够规定的劳

动合同违约条款只能是一般性的、笼统的,甚至模糊的。除非因为雇员刑事犯罪或者企业明确资不抵债等情形,否则,就一个企业是否处于经营困境或者一个雇员是否真的无法胜任所在岗位等标准,仲裁机构和法院很难判定。一旦判定依据不够明确,那么一些干扰因素就可能出现。比如企业的游说可能使裁决有利于雇主;同样,雇员的社会行动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又可能让裁决有利于雇员。至于何种结果出现,取决于当时仲裁者或者法官对社会成本和其私人收益之间的权衡。而这种权衡不再是一个效率和公平的平衡问题,而将演变成了一个政治过程。

由此可以看出,最低工资管制也好,劳动期限管制也好,管制者的初衷在于通过这些具体的管制政策来改进雇员的福利,但管制者可能没有想到,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都会对管制措施采取激烈反应。这种反应会改变立法者的初衷,从而把法律引向对资源配置不利的境地。管制得越具体,对结果分配的影响也就越大,劳资双方的反应也就越快捷和越强烈,结果会导致原先的制度设计变得越来越糟糕。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更好的各择制度呢?比如对雇员的救济为什么要通过最低工资管制?而不是通过其他救济形式?比如社会保障。通过最低工资来改进雇员福利,还不如降低雇员的医疗和受教育的成本。再比如,为什么要通过具体的合同期限管制来保障雇员权益?而不是赋予雇员集体谈判的权利?各国的实践表明,后者要远远好于前者。

说到底,管制者采取的劳动管制模式可能并不是出于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而仅仅是出于表达自身的权力,这正是布坎南等人在50年前就提到的观点。

■世话实说

身处衰退漩涡,中国凭什么鹤立鸡群

——浅探2008世界经济与中国周期性风险



◎程实
金融学博士,供职于ICBC总行

2007年世界经济的斗转星移留下了太多悬念和未知,以至于2008年所有美丽的等待和希望就像玻璃橱窗里布满红色樱花的慕司蛋糕,近在咫尺却并非触手可及。当我们用希望这根红线将2008年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奥林匹克、次贷危机这些字眼拴在一起时,赛程卡却在一边喃喃细语:“如同锁住囚犯和看守的一根铁链,希望和忧虑也形影不离。”

我从来不是个悲观主义者,至今依旧习惯于对美丽世界有着种种近乎乌托邦式的神奇幻想;但我更不是一个盲目乐观者,朦胧的理性总是让我萌生种种不合时宜的忧患思维。这种希望和忧虑形影不离的情感纠葛在我写完本栏上一篇之后再度浮现。当我用“转变”这个关键词概括2007世界经济风云变幻的时候,一连串的疑窦在心底打滚:身处转变漩涡的中国何以岿然不动,鹤立鸡群?一路高歌猛进的东方神话还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吗?

哪怕不是写在专栏,我还是会说YES,毕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经济这驾高速列车会骤然放缓。世人看到中国制造依旧所向披靡,投资狂潮依旧浪涛汹涌,消费行情也是水涨船高,似乎由“过热转向过热”的担忧才更加实际,为中国经济硬着陆牵肠挂肚听上去就像杞人忧天一般愚蠢可笑。但问题就在这里,经济规律往往总是会在人们毫无防备时猝然一击,如果风险的爆发能够全然预料,那么经济危机从来就不会像历史演绎的那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事实上,很多人,包括初闯门楣的学术门徒或是过桥无数的老人,都对经济周期的铁律了然于胸: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饕餮盛宴和粗茶淡饭的反转轮替就像潮汐一般自然而又无可回避,中国经济不可能例外,再“长期”,再“稳健”的经济增长也总会面对由高潮向低谷的周期转变。既然2007世界经济发生了那么多的转变,为什么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在2008年发生滞后的“转变”呢?至少我们能给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找到几个理由。

不得不提的首要因素是世界经济的放缓。无论是IMF还是OCED,所有喜欢预测的机构和个人都不约而同地下调了2008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面对参差不齐的预测,我们也许有理由嗤之以鼻:这区区几个百分点的变化又能带来几多中国共荣?但我们很可能不经意间从两个方面忽略了这个问题的严肃性:

一方面,世界经济放缓可能比“贝利”们预测的更加糟糕。2008年的开端已经让人嗅出了衰退的味道,羞于见人的各种就业数据,历史新高

的进口价格增幅,不断下滑的消费信心指数预示着山姆大叔内忧外患并存,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次贷危机真实效应的延续或是新一轮经济泥沼的开始。无论如何,滞胀背景之下,美国经济周期的逆转并非伯南克或是保尔森之辈所能轻易挽救。当然,我们很可能在2008年下半年看到美国经济闪亮反弹,但这不过是大选年必有的“政治周期”,也就是说,美国的深层窘境可能比七年初大家看到的更为惨烈。欧洲、日本也是问题多多。过快的升值让欧洲出口吃尽了苦头,过高的通胀也让共同警戒线形同虚设,于是世人不得不在为出口导向型的欧洲经济心存担忧的同时,再为欧洲货币一体化和雷深陷入捏一把汗。在日本,2008年初领先指标的惨淡让大家很快忘记了过去一年中用显微镜才能透视到的复苏,重回熟悉的暗角看来并非毫无可能。至于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这些新兴经济体,他们的增长从来没有像姚明中投那般稳定,而且他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能在很久之前就被别有用心地夸大了。

而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放缓对中国经济周期的潜在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脱钩(decoupling)”这个时髦的词汇似乎给我们带来了几个莫明的底气和信心,但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就走进了逻辑误区,将经济周期的短暂“错配”理解成了长期“脱钩”,所谓“脱钩”的依据,不过是中美经济增长在次贷危机后的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独立增长,实际上中美都在相互合作加深中获得了共同收益。只不过次贷危机抵消了美国的那份,却留下中国这份,仅此而已。面对1.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2.17万亿的贸易总值,谁能自信大胆说“脱钩”?另一个给我们带来错觉的时髦词汇是“多元化”,次贷危机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较大影响的理由之一似乎在于中国不再是一棵树上吊死的傻瓜,其实篮子而分散,当运篮子的车翻了,不同篮子里的鸡蛋都难以幸免。在中国对外开放度与日俱增的当下,世界经济增长的转变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可回避的深远影响,就算可能会有滞后,但将来的总是会来。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叨叨絮絮才说完了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也许有些耸人听闻的意味,但我是想强调:在又好又快的发展过程中,更应该关注中国经济的周期性风险,而世界经济增长很可能加大这种风险的外部要素。当然,外部因素并不尽于此,国际货币体系动荡、全球资本市场震动和次贷金融余波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给中国经济施加影响。而且,加大中国经济周期性风险的还有诸多内部因素,一向被视作利好因素的奥运经济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此话怎讲?且听下回分解。

■经世论衡

广东又站在了历史新起点上



◎夏业良
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新任命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广东当前的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关键时期。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提出地,广东要以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

许多多位亲友在广东深圳、珠海、广州一带居住,父母近年来也长时间在深圳居住,加上我经常去广东各地参加学术会议、讲学等活动,一向被视作利好因素的奥运经济可能给广东带来深远影响。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此具有震撼力的口号推动下,许多昔日的禁区 and 障碍,顷刻间分崩离析。即便是那些沿袭已久的经典教条在不言自明的现实面前也不得有所收敛。一年之后,“改革开放”在经济上的实验性尝试便在广东、福建逐渐展开。无论是深圳、珠海特区,还是广州、潮汕、海南,都发生了不同凡响的变化。

和社会生活将会陷入怎样的困境!

如今的“80后”或“90后”新生代,对于30年前的中国制度与社会状况了解甚少,偶尔会在心境好奇之际,洗耳恭听父母或祖父母辈不厌其烦地叙述那“遥远”的故事。然而,我有个并非危言耸听的担忧,那就是,一旦经历过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生活的几代人逐渐离开人世之后,我们的后人是否会因缺乏亲身经历的强烈对比,以及发自内心的决绝而失去制度变革的内在动力?

深圳不但是最早的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的前沿,而且还在1992年最先沐浴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正是这一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讲话,奠定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路径和15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

有人说,真正的解放是思想的解放,而真正的思想解放只能有一次。我很认同这一说法,并且相信:只有建立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社会,才是最根本的思想解放。我还以为,无论是哪一届政府,无论什么时候,都应当追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目标——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

法性和正当性。拥有这样一个长远而稳固的共同目标,也将使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与国家之间形成一种现代契约:国家(政府)鼓励和促进我们共同的福祉,保障全体国民的自由、权利和利益,国民通过选举对有效的执政予以肯定和鼓励,对于无效和低效的执政予以否定和撤换。

要把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努力扭转传统的发展观念和方式,形成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体制机制,制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政策措施,完善决策使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把落实科学发展观变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意识和行动:无论是深圳还是广东全省,都面临着更加艰巨的挑战。如何能够超越历史,超越自我,超越政策优惠,超越资源禀赋限制,超越制度约束和惯性路径依赖,不但全国人民注视着深圳和广东,外部世界也同样关注着广东乃至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看我们到底如何超越资源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究竟怎样摆脱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传统发展模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

在我看来,21世纪的中国人,给予世界的整体印象应当是:富有责任意识,坚定、理性而自信,开放、自由与和谐。在历史上,广东曾经是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开放之窗,最先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广东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广东人素有闯荡开拓精神,正如俗话说:“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必有华人,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必有广东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当代史中,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数不胜数,他们推动历史进步的业绩功不可没。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人会续写怎样的改革新篇章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排沙简金

中美投行合伙关系新标本新考验



◎王育琨
《经理人》商学院院长

美国次级债危机风狂雨骤,老牌投行频频遭遇滑铁卢。缺了双腿的狮子,一下子成了环伺狼群眼中的猎物。为摆脱困境,他们纷纷寻找自己理想中的白衣骑士。

2007年10月22日,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率先在中国找到了中信证券这个亚洲最大券商。此后,花旗集团获得阿布扎比投资局75亿美元的注资,摩根士丹利宣布,在其创记录的94亿美元资产冲减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其投资50亿美元,美林则与新加坡淡马锡控股谈判,可能向前者注资至多50亿美元。在所有这些交易中,大多数投行选择主权财富基金作为白衣骑士,因为它们不参与公司运营和监管,只为获得稳定高回报。而贝尔斯登跟中信证券则是两个大投行之间的联姻,意味深长。

在中信证券与贝尔斯登达成战略合作方案中,中信证券将从贝尔斯登手中收购10亿美元40年期可转换优先证券,在经过完全稀释的基础上,这部分证券可转换成贝尔斯登6%的股权,并可增持至9.9%;贝尔斯登出资10亿美元购入一笔6年期的可转换债券,以及一个五年期权,摊薄之后将持有中信证券2%。双方约定在香港成立合资公司,双方将整合各自在亚洲(非中国大陆)的业务投入合资公司,并各占合资公司50%股份。贝尔斯登将把日本、新加坡、香港的业务整合装入香港合资公司,而中信证券则将增资扩股后的中信香港装入合资公司。眼下业界关注的焦点是,贝尔斯登在这家股权平等的合资公司里,会否真正拿出亚洲业务来合作?

美国金融界似乎并不看好贝尔斯登与中信证券在香港的合资公司,因为之前摩盛、高盛分别称将把亚洲业务装入中金公司,但却均未实施。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已在计划出售中金公司(CICC)34.3%权益。两个已经牵手13年的默契伙伴,似乎要在2008年走到“离婚”尽头。西方评论家说贝尔斯登是临时抱佛脚,只求摆脱眼前危机。我却以为,中信证券与贝尔斯登的结盟,并非权宜之计。

贝尔斯登与中信证券的谈判,其实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就开始了,当时贝尔斯登的股价还高高挂在160美元左右,而中信证券当时的股价仅为15元人民币,至达成交易协议时则分别为116美元和110元,截至2008年1月4日,则价格分别落至78.87美元和88.50元。

再往早一点说,当贝尔斯登的强势老板吉米·凯恩1992年任命时年29岁的唐伟出任贝尔斯登亚洲公司董事长时,就已经开始布局了。唐伟是推动这宗交易的关键人物。是他一路从建设银行到中信集团追踪常振明,最后终于说动了中信卸任董事长王军。跟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的交流,则更投缘:两人都对野村证券20年前错失良机,没能成为全球性大企业的前车之鉴,感慨颇深。

一如其他美国大投行,此前贝尔斯登一贯专注于在中国建立人脉自主发展,有时也跟中国产业资本合作,或者跟着好的团队合作,但却还没有跟中国同行各50%的合作。这次在香港跟中信证券绑在一起,或许标志着贝尔斯登改变了以往直捣黄龙式的直接战略,而采取了跟当地投行建立稳固伙伴关系的间接路线战略。《间接路线战略》是被誉为“20世纪最富有创造性和影响力的战略家之一”的英国军事战略家利德尔·哈特的代表作。哈特通过梳理2500年的战争史发现:大凡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间接路线是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战略形式。

双方合并遇到的难题不少。首先看吉米·凯恩对中国的战略是否像他自己说得那样是长期而坚定的。凯恩是否会在与中信的联姻中兑现承诺,把贝尔斯登的亚洲业务注入香港合资公司,是这宗交易成功与否的最大变数。

贝尔斯登的海外业务占业务总量的20%,亚洲的非中国大陆业务不多。贝尔斯登亚洲雇员在500人以上,中信香港则有200多人,现在在国内投行从业经验的人正相继报名投效,对薪酬的预期是个决定因素。王东明和傅伟青对新野村证券经验,亚洲其他国家的本土化人才更受他们青睐。

切入任何一个资本市场,都需要不带成见地一刻接一刻地感知和行事,这恐怕是吉米·凯恩下定决心与中国投行组成联合体原因。各自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要到2月才能见分晓。双方董事会和经营团队,是否能够摒弃先前成功运作的成见,一刻接一刻地把握活生生的本真,尤为关键。

不过,依我看,这宗有着重大标本意义的交易成功与否,真正考验功力的,还是双方文化的融合。这是最大的难题。1979年,年轻的霍康到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此后,为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建立中国投资银行团队,后又受摩根士丹利委派出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和COO,亲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股份制改造,并参与了一系列重大股本及债券交易。他本以为是已深刻了解中国国有企业内部的情况,然而到中金之后才意识到,“还远远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公司的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霍康的经历和体会很有意义。企业文化是一群人基本价值观的交融。企业合并落空或失利的主要原因不是没有正视两种文化交融中存在的困难。同财同法尽职调查同样重要的是企业文化尽职调查。在整合前,发现双方的重要差异和共同性,对此作认真分析,看哪些是该妥协的,哪些是该坚持的,以期使非生产性冲突可能性降低。只是两大投行习惯于为他人做财务顾问,却不见得精通文化尽职调查和文化整合。